

熔炉烈火

哈尔滨龙吉玻璃厂厂史

工人出版社

熔 炉 烈 火

——哈尔滨元吉玻璃厂厂史

哈尔滨元吉玻璃厂厂史編委会編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安定門外六鋪炕）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 009 号

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經售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数：37,000·印张：2·印数：1—118,000

1965年12月北京第1版

196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統一书号：10007·79

定 价：0.18 元

目 录

四百块钱 血腥起家.....	1
童工血泪.....	2
烈火旁熬煎.....	6
“催命料”.....	9
用不着一脚踢开.....	10
坑人局.....	12
吃的猪狗食.....	15
穿的麻袋片.....	18
“份子掌柜”.....	21
豺虎同行.....	23
蛇狼宴会.....	28
被榨尽血汗之后.....	31
一笔血账.....	34
熔炉怒火.....	36
第一次伸直了腰板.....	38
跟资本家算剥削账.....	42
反击.....	47
太阳照在熔炉上.....	51
红花满炉开.....	55

四百块钱 血腥起家

哈尔滨元吉玻璃厂，在这黑龙江省一带，远近闻名。这个厂从一九〇七年开办到现在，已有五十八年的历史了。

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之后，清朝皇帝丧权辱国，和英、法、美、日、俄等帝国主义国家，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。就在这时候，沙皇俄国的将军和商人们，象蝗虫似的大批大批地涌进松花江畔这座美丽的城市哈尔滨来。这些酒鬼们，用搜刮中国人民的血汗钱，盖起精致的洋楼，花天酒地地酗酒享乐。那时市内还没有玻璃厂，平时不大显眼的酒瓶子，一时竟成了缺货。

早年来往于哈尔滨、海参崴之间搞投机买卖的刁羽翎和他兄弟刁忠堂，靠搞买盗卖弄来的钱，在哈尔滨道里买卖街开设了一个元吉号粮庄。这时，这兄弟俩一瞅酒瓶的买卖这么好，就从粮食店里拿出四百块钱，在道外西门脸这地方，开办了元吉玻璃厂。

那时才只是一个小厂房，两个“小鸡蛋缸”。这缸的形状，两头尖，中间鼓，形状很像个鸡蛋，所以玻璃工人给它取了个外号，叫“鸡蛋缸”。刁羽翎就以这一点点资本，卡着工人的脖子，喝着工人的血，发起家来。

在那苦难深重的年月里，玻璃工人中间，流传着这样一

首歌謠：

提起玻璃匠，終生苦難忘。
打保進元吉，三年苦水熬，
摸黑三更起，身披破衣裳。
干活沒鐘點，累的痛斷腸，
睜眼就挨打，燙死活遭殃。
冬天爐里睡，夏天地上躺，
个个打光棍，窮的剩鞋幫。

這歌真是一個字，一滴血，繪出了當年在資本家的血腥壓榨下，玻璃工人的一副悲慘仇恨的生活畫面。

童工血淚

在這玻璃廠里，首先受到最殘酷剝削的就是童工。

刁羽翎在最初開玻璃廠的那一年，僱了二十來個工人，其中十三四歲的童工，就占十五六個。從一九〇七年辦廠，到一九四六年哈爾濱解放，這長長的四十年，每年這個廠僱的童工，都在三分之二以上。有一年老師傅全被辭退了，就剩了五十多個童工干活。童工替他沒黑沒夜地干一天，只得一毛一分六厘錢的報酬。說是每天一毛一分六，月月還拿不着錢。童工們要支個塊兒八角的，求了工頭，又求賬房，到頭來錢支不出，說不定還要挨一頓鞭子。

黑心腸的資本家，就象一只喂不飽的豺狼，吃了人，連骨头都不吐一根。

這姓刁的資本家還立了這麼一條規矩：收童工，家在哈爾濱的不要。他要的，是那些無依無靠，在關里被地主逼得走投無路的窮莊稼人的孩子。除了這條，還規定：到元吉來



童工每天睡四個來鐘點，就被工頭用鞭子抽起來。

当童工，在厂里有认识人的，只要一家铺保。无亲无故的，要三家殷实铺保。不满三年不准走。要走，一个铜子不给，还得包付三年的伙食钱。穷人家的孩子来当童工，都是被那个吃人的旧社会逼的没活路了，才投这条苦道，穷的光着屁股都没裤子遮，哪来的钱给资本家包付伙食呢？明知是火坑，也只得闭着眼睛往里跳。

资本家刁羽翎还叫工头特制了一根皮鞭子，用来专门管童工。

这鞭子是用两条两尺多长的胶皮缝起来的，中间用细电线捆上。这鞭子打起人来，就象针朝肉里扎一样。

童工每天早晨两点多钟起床，有时到晚上十来点钟才干完活。正当发育成长的年青人，每天就睡这么四个来钟点，哪有个不困的？刁羽翎每天临到睡觉了，还忘不了招呼工头：“记着到时候把这些小兔崽子喊起来，别误了干活。”

看东家眼色行事的工头，不用刁羽翎嘱咐，他也懂得怎样替他的主子效劳。见天三星未落，工头赵士丰就披着衣服，站在草棚门口大着嗓门喊：“看啥时候啦，还不快起来上工！”

孩子们头晚干到大半夜才下工，这才刚躺下一小会，一个个睡的正熟哩，谁也没听见工头的喊声。赵士丰走到厂房溜了一圈，看还没有半个人影进来，他提起那根特制的大皮鞭，闖进草棚，不由分说就唰唰地乱抽一阵，尖着嗓子骂：“小兔崽子，看你们还贪睡不贪睡！”

老工人王永利那时才十二岁。有一天他拿瓶子没拿稳，摔到地上砸碎了几个。在玻璃厂，摔坏几个瓶子，这本

来不算个啥。可那年月，誰把童工当人？晚上九点过了，王永利累的腰酸背痛，刚爬上吊鋪，钻进被窝躺下，工头赵士丰凶神恶煞地闖进来，掀开被窝，一把把王永利拉下鋪来，連問都沒問，举起皮鞭，一連抽了四十几鞭。打的王永利直在地上滾。打完之后，又狠狠地罵道：“看你下回还敢不敢摔坏瓶子？”十二岁的王永利，滿身被打的青一块、紫一块，第二天天沒亮，又被工头逼起来干活。

这一年中秋节，一早，刁羽翎放出話來說：“今天八月中秋，小兄弟都加把劲，早点把活干完，好洗洗脸，上江沿遛达遛达去！”

一听这話，关进籠子里的童工，心都喜开了花。外人不知道，这元吉玻璃厂的資本家，对童工还立了这么一条規矩：进厂三年，不准上街。怕的是孩子玩花了心，耽誤了干活。这天东家放話，叫上街遛遛，那不比过年还乐？小童工們干完了炉上的活，又給炉上抬完煤，忙到下午五点，才算搞利索。洗把脸，吃完饭，都上大街玩去了。

工头赵士丰一看表，六点过了，还不見这些学徒回来，罵道：“这些兔崽子，一放出去就回不来了。”拿着那根大皮鞭，坐在大門洞里守着。沒过一会，这些小学徒，一个个高高兴兴地回来了。老工人徐士安还記得：他第一个进門，前脚刚跨进大門洞，劈面就挨了一皮鞭。上街的四十多个童工，进来一个，打一个，个个都挨了狠狠的一皮鞭。

在那个世道里，童工有理无理，都得挨揍。老工人尙鴻业說：“那时我一听喊起床，心就吓的直跳，不知道这一天，又要挨多少次打呢？……”

烈火旁熬煎

那一座座料液翻騰的熔炉，溫度高达一千三百多度。還沒走近炉門，热呼呼的料液，就烤得肉痛。那年月，这姓刁的資本家，把工人的血榨干了，他还嫌不够哩，那肯拔出一根錢毛来改善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。日日夜夜，工人就在这高溫炉旁，忍受着烟熏火烤。

那时候，燙伤、烧伤、受热过度，當場昏倒的事，天天都有。燙伤了，热昏倒了，工头还气凶凶地跑过来問：“喘气不喘气？能喘气，就得給我干！”

有二天天挺冷，刚滿十一岁的小童工郭万义两点来钟就被工头喊起来上工。走进車間，又是蒸汽，又是烟熏，弄的人都睜不开眼睛。当时一个老师傅站在炉前挑料，郭万义正要过去开模，迷蒙蒙地看不清，一块火紅的料液，正碰在郭万义的左眼皮上。这幼嫩的眼皮子，不說碰在那一千多度的料液上，就是随便碰在这炉旁的哪一件滾燙的工具上，不燙烂，也得燙肿。这孩子燙的尖叫一声，就昏倒过去了。炉上的工人，忙拿着碗，化盐水，替他洗燙伤的地方。正在这时，一个姓王的工头走了过来，一边分开众人，一边說：“干活去，干活去！看什么？”

他瞅了瞅躺在地上的郭万义，假仁假义地問：“你看，咋不小心哩？上药了沒有？”

沒等別人回話，接着又說：“下回小心着点。弄布包包，

快去干活吧！”

郭万义說：“我眼都睜不开，咋干呢？”

“咋干？你那只眼不是沒燙嗎？”

不干吧，命捏在人家手心里，想跑也跑不掉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只好吞下眼泪，忍着痛，一只手捂着烫伤的眼睛，又去干活了。这不是干活，这是叫资本家、工头逼着去卖命呵！

学徒王永利，好不容易熬到“出师”了，有天，他肚子痛。还得站在炉前，拿着一根挑料杆，往模里放料。豆大的汗珠，雨点似的从头上淌下来。肚子痛的实在挺不住了，他才放下挑料杆，蹲在炉前歇会儿。那天正生产三斤重的大酒瓶子，一个工人从炉里挑出一块三斤重的火烫火烫的料液，正要往模具里放，刚把料杆一举，誰知料沒挑稳，唰一下象团火球似的掉在王永利的褲子上了。那条破褲子，立刻着火了。大伙一看，連忙打了一桶水，朝王永利的褲子上泼。火灭了，那块通紅的玻璃料也掉下来了。王永利的半个下身，却烫的皮开肉裂，鮮血不住地直朝外冒。人烫成这个样子，大工头赵士丰走来一看，还問：

“能干活嗎？”

平时不敢讲话的小徒工，也被这句黑心話問的气憤了，七言八語地說：人都燙的不能动弹了，还怎么去干活？

赵士丰一看众人的气憤情緒，这才沒敢再逼下去。

一連半个来月，王永利躺在床上，身都翻不了。沒有药治，每天就弄点盐水洗洗伤口。这伤口一沾上盐水，簡直痛的钻心。整个下半身都化脓了，小便烫烂了，每回尿的都是血。一躺躺了个把月，才能慢慢撑起来走道。他去找賬房

想支点工錢，賬房沒好声气地說：“躺着还要錢？东家說啦，歇工不开工資。”

資本家的心，就是这么黑。

那么强的高温作业，夏天連个凉开水都不給預备一点。老师傅自己挑块玻璃料，吹个尖头尖脑的玻璃罐，装一罐子凉水放在手跟前喝。这罐子的外形，活象个尿壶，大伙苦笑着給它取个外号，叫“尿甃子”。一罐凉水，也解决不了問題。暑期一到，人人热的气都喘不过来。一天的活干下来，每个人的脸，跟死人臉一样煞白焦黄。

苗永敏已經是个十八、九岁的棒小伙子了。两筐煤，一百几十斤重，不費劲地就挑起来了。有一次，他在炉前干活，先是汗水象下雨一样，把披在身上的一条麻袋片，浸的透湿透湿。脸上象火烧似的，紅的透亮。跟着脸色由紅发黄，泛白，全身一陣凉，热昏过去了。昏倒以后，工头給他头上泼一盆凉水，刚醒过来，又催着他去干活了……

夏天的日子难熬，冬天来了，也不好过呵！資本家只顧从工人身上榨取血汗，哪管什么設備。一个厂房，上边一片鉄皮屋頂，周围就弄点板子隔一隔。有的老工人坐在炉前管开模，开模这活是坐着干的，面前是座大熔炉，烤的火痛；身背后就頂着破板墙，北风一刮，大朵的雪花都从板縫里钻了进来。冻的受不了，只好弄块破麻袋片披在背上。因为没有棉鞋，一对脚后跟冻的象烂梨一样。

“催 命 料”

元吉玻璃厂的工人，都把“回头料”叫“催命料”。这又是刁羽翎盘剥工人的一个绝招。

什么叫回头料呢？

那时这玻璃厂用的“小鸡蛋缸”，已由两个，发展到四个。虽说是四个缸生产，每个“小鸡蛋缸”还只能熔化一百五十斤玻璃料，四个缸合在一起，大不了才六百斤。可那时候全厂的三十多人，每天两点多起床，下晚八九点还完不了活，被这四只小缸拖的团团转。原因就在这“回头料”上。因为工人刚干完头一缸料，工头就赶着把这只空缸，又下上了料。等工人干完最后一只缸时，头只缸的新料，又熔化好了，成了连轴转。

这刁羽翎每天天没亮，就戴着黑缎子瓜皮帽，扶根黑漆手杖，一盘炉一盘炉地挨个儿看。一看工人把第一个缸的料使完了，去干第二个缸的活儿的时候，他就招呼工头说：

“大兄弟呀，这缸空出来哩，快投上半缸料吧！”

工头一听，就瞪起横眼珠子骂起下料工人：“你是死人啦！没看缸在空着肚子？还不快把料下进去！”

工人累的腰酸骨痛，衣服被汗水湿的拧得下水来，刚把最后一缸料干完，好不容易才能喘口气，回头一看，那才干完的几只“小鸡蛋缸”里的料，又是满满的……

工人的血汗，把资本家刁羽翎的胃撑大了。到一九二

五年前后，又扩充六只缸，两座元炉。生产能力，整整翻了四倍半。

换了大缸，刁羽翎照样下“回头料”。真是一块玻璃，一片血。

有个叫赵福昌的老工人想：再这样干下去，一条命就要拖进去了。他跟同伴商量，要走。

“上哪去呢？”

他听说长春也有玻璃厂，兴许那里要好些。就说：“上长春。”

他省吃俭用，攒下了二十几元钱，第二天买了一张车票，偷着上了长春。到长春一看，嗨，天下资本家的心一样黑，那边玻璃厂的老板，跟刁羽翎是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，工人想支点工钱，连块儿八毛都不给，一次只给个三毛两毛的；可是干起活来，恨不得叫你一天给他干二十四小时！不得已，只好又回到元吉来。

用不着一脚踢开

那年月的玻璃工人，干着这么苦的活，还提心吊胆，就怕东家请“吃元宵”。工人管这叫“吃滚蛋丸”。

头年腊月，工人没日没夜地生产出来的酒瓶、煤油灯罩，一筐压一筐地堆满一院子。年三十停炉。正月十五，资本家照例把工人“请”去吃一顿元宵。吃过元宵，不用问，回来就得夹起破被卷，抬腿出门。

可是元吉玻璃厂的资本家刁羽翎，做的比这更绝。

一九三〇年，是元吉玻璃厂大发展的一年。这一年春天，他又新修了能熔料七吨多的一座大池炉，秋天开炉生产，雇佣了一百八十多名工人。连干了四个月，产品堆的象一座小山。刁羽翎一想：这些产品够卖半年了。留着一百八十几号人到来年正月半，不说工钱，光粮食得吃多少！腊月初七那天，玻璃工人累死累活干到晚上九点多。第二天腊八一早，刁羽翎就突然宣布停炉刷人。

临到把工人赶出大门，刁羽翎还要在工人身上捞一把。那时还用铜子，一块换十吊。可是铜子，份量重，谁都不喜欢要它。上钱庄，用九毛钱的钞票，就能换回一块钱的铜子。刁羽翎自己也开着一座钱庄，他打发眼房上自己的钱庄去用九折换回了几麻袋铜子，按一块顶一块，给解雇的工人开工资。

一百多工人，前前后后来到了眼房。刁羽翎亲自坐在眼房柜上，给工人发钱。该开支二十块的，给十二块钱的钞票，八块钱的铜子。这么一折腾，又在每人身上，刮去块儿八毛的。

司炉工人张培兰、王大汉、尚怀雨，都是在元吉多年的老工人，他们的血汗都快被刁羽翎吸干了，现在用不着了，就把他们一脚踢开。当他们夹着一床破被子，走出大门时，刁羽翎还从屋里赶出来，假惺惺地说：“这是不得已的呵。买卖不好，东西没人要。等来年买卖好点，再请你们回来。都是本乡本土的人嘛！”

张培兰走出大门，问王大汉：“咱们上哪去哩？”

王大汉苦笑一下：“还有什么地方可去？”他用手朝对门一指：“蹲小店唄！”

蹲小店，这小店也是资本家老刁家开的。他用开玻璃厂剝削来的钱，买了这座客店。为的就是“接待”这些被他赶出厂门的失业工人，让他们在玻璃厂拿的工资，原封不动地交给小客店，再回到他的口袋来。

大年三十的这一天，都快十点了，张培兰、王大汉、尚怀雨三个人，还缩在一条破被子里下不了炕。外面下着鹅毛大雪，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，把这小客店的房间都冻的象个活冰窖。除了身上穿的一件破棉袄，再也没有第二件能抗寒的东西了。碰上这样的天气，别说不能出去找零工卖，连大门都出不了。

王大汉一看，不行呵！再不起床，下晚饭店关门过年了，大年初一连饭都没得吃的。

大年三十，资本家刁羽翎全家老小，儿子儿媳，侄儿侄女，闹哄哄地围在红漆圆桌上，吃鱼吃肉，放鞭炮送年。王大汉、尚怀雨三个人，缩着冻得发抖的身子，冒着门外的纷飞大雪，拿出身上仅有的几毛钱，买了二十多个苞米面窝窝头回来……

坑 人 局

资本家刁羽翎，不过腊八就把大批工人解雇了。侥幸留下的人，工资也被打了二八扣。就是剩下的这一点点

錢，也在工人口袋里裝不熱呼。

大年三十吃完年夜飯，會計刁鳳山就招呼起來了：

“大伙來呀，少東家陪你們推牌九啦！”

這一招呼就是給你個訊。好玩牌的得去；不好玩牌的，也得去湊個熱鬧。

老工人楊林棟吃罷年夜飯回來，走回宿舍，躺在草棚的吊鋪上，難過的半天沒言語。他想着在山東老家的娘呵！這北風呼號，遍地冰雪，娘這時是餓着肚子？還是喝上了一碗苞米糊糊？

這時，刁鳳山一頭鑽了進來，笑嘻嘻地拉起他就往外走。

“啥事啊？……”

刁鳳山一邊拉着他走，一邊說：“好事！好事！推牌九，推牌九！”

楊林棟跨進賬房門朝屋里一瞧，電燈底下的大圓桌旁邊，已經站滿人，他畏畏縮縮地說：“我沒錢吶！”

“沒錢好說。”刁鳳山把他朝桌邊一推：“賬房借支，賬房借支。”

這少東家叫刁家義，是刁羽翎的二兒子。他穿着一件青緞藍花的狐皮短袄，一邊洗牌，一邊嚷着：“誰押？誰押？要發牌啦！”

幾個工人，有押一塊的，有押三、五毛的，滿滿的一圓桌，押了二十多份。楊林棟從口袋里摸出唯一的那十塊錢，拿出兩塊，把剩下的八塊，又小心翼翼地用布包好，裝回口袋。他不敢多押，只押了兩毛錢。

少东家一翻牌，嘿，一对“天九”。他伸手把桌上押的錢，朝怀里一捞，收了个精光。

越押越輸，楊林栋口袋里的十块錢，就剩三块了。他一賭气，把三块全押上了。不信会老是“天九”。

这回桌面上的錢，比原来的要多好几倍。大伙瞪着眼睛，注視着少东家手上的那两张牌。

“押好了沒有？翻啦！”

这回两张牌的点，变了样，少东家刚一翻牌，一眼瞧見是个大“閉十”，忙說：“重来，这回不算啦！”

他这一洗牌，大伙都楞了：贏了，錢是他的；輸了，錢也是他的。

平常工人要借支几块錢，难得很。这回推牌九，誰輸了，少东家一开口就是：“賬房挂賬！”这一晚上，楊林栋把口袋里唯一的十块錢輸光了不算，还在賬房挂了三次賬。

元吉玻璃厂平时不給工人开工錢。一年三节，給工人开一点。工資一开，刁家义的牌九就摆开了。

楊林栋在这个工厂里干了三年。这三年他就給他娘郵回二十块錢。第三年尾上，他趁停炉的时候想告个假回山东看望他娘。會計刁凤山翻开他的一本小折子，一拨拉算盘珠子，說，

“我說大兄弟，你賬上沒存錢呵？”

“怎么？我三年的工錢，還沒开一半哩！”

“这不是，你看看賬！”刁凤山把那小本本朝他面前一丢。

那上面密密麻麻的記了好几頁。哪年中秋节，他推牌

九挂了多少錢的賬；哪年過年，他輸給少東家多少錢。扣來扣去，三年的工資，就剩下了八角六分錢。

他大爷那时在哈尔滨拉脚，給他买了一張火車票，送他回了山東。他一進屋，娘見他在外面混了這幾年，大冬天，還穿著一雙沒後跟的破皮鞋，連雙棉鞋都沒混上，鼻子一酸，就哭了……

吃的猪狗食

元吉玻璃廠的工人們，勞動的時間那麼長，勞動的條件那麼壞，資本家每天給他們什麼吃的呢？要問這些，工人的回答是：菜市上的菜，什麼最賤，你不用上菜市去打聽，到元吉一看工人吃的是什麼菜，這菜就是最賤的。

春天小白菜大量上市了，就熬一鍋小白菜。夏天西葫蘆多，就熬一鍋西葫蘆湯。端出來一大盆，連個油花都看不見。

那時這元吉玻璃廠分三等飯。頭等飯是刁羽翎和他的兒子兒媳婦，侄兒侄女吃的。天天是燒魚、燉肉，溜炒兩三樣，頓頓還叫大師傅潘永盛送到樓上去。吃膩了，刁羽翎的二兒子刁家義，就把潘永盛大師傅叫去，在道外酒館里喊幾個菜來。二等飯就是賬房和工頭吃的。剩下的三等飯，就是一盆沒有油的西葫蘆湯，叫工人吃。

有一天，是西葫蘆拌醬，盛了一大盆。這玩藝天天吃，把人的胃口都吃傷了。徐士安、王坤、袁克貴等許多人都端着碗瞪着菜盆，誰也沒朝菜盆里伸筷子。這時刁羽翎捧着

水烟袋，迈着八字步过来了。一看，一盆西葫芦拌酱，还一筷子不动地放在那里，他眉头一皱，干癩着嗓子说：

“怎么啦？吃不了啦？吃不了，告诉老庶务一下，明天少做点！”

他这一讲，本来每顿是一盆西葫芦拌酱，第二天就成西葫芦汤了。

碰上生产情况不好，这刁羽翎也在伙食上找叉子。

有一天，酒瓶子出的废品多。趁大伙吃饭的时候，他迈着八字步来了。提起手里的黑漆手杖，敲着地上的菜盆，说：“今几个生产可不好哇！饭食不好，叫老庶务改善改善嘛，别这么整呵！”

第二天开早饭，本应该吃干的，他却叫大师傅熬了一锅粥。

那时工厂的厨房，也不叫厨房，大半截都在地底下，活象个地窖。白天点着灯还看不清。夏天，苍蝇、蚊子，成堆地朝锅里掉。这天煮的一锅稀饭，小徒弟给账房先生打去一盆。账房先生拿起饭勺一搅，一只五寸多长的大耗子，圆挺挺地泡在稀饭里。把他吓的把勺一丢，失声一叫，正被坐在账房里屋的刁羽翎听到了。他连忙走出来说：“掉个把老鼠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”

说着，他招呼小徒弟说：“把这稀饭给收了，到饭馆去替账房先生叫一桌饭来。”

等小徒弟走后，他奸头贼脑地说：“你这一叫喊，要让工人听到了，一锅稀饭，不白瞎啦？”

晚上，那个侍候账房先生的小徒弟回宿舍睡觉，才把这

事告訴了大伙。大伙一听，吃了死耗子粥，一陣恶心，好多人都哇哇地吐开了。

刁羽翎不是在道里还开着个粮食店嗎？碰上高粱米、棒子面卖不出去，生霉变质了，他就拿到厂里来給工人们吃，叫賬房按好粮食价錢付給他的粮店。只要有利可图，他哪管工人的死活！

日本鬼子要垮台的头两年，粮食更紧张起来了。吃頓白面大米就算“經濟犯”，抓去罰款、坐监牢。刁羽翎正好抓这个空子和日本鬼子里应外合，合起調子来克扣工人的粮食。开头，一个姓刁的工头下了一条規定，每頓吃飯，就限十五分钟。吃得完，吃不完，都得收碗。这姓刁的工头神气十足地当众宣布說：“皇軍有話啦，大伙都要节衣縮食。当师傅的，自量点，十五分钟沒吃完飯，东家也不說什么啦，自动捆行李退厂。学徒嘛，不滿三年不能走，沒吃完飯的，到时就一律收碗。”

每次吃飯，这工头就拿着鞭子在旁边看着。每次还没到十五分钟，他就吼着叫着逼着大伙把碗放下。有的学徒吃的慢，他就举起鞭子，沒头沒脑地揍你几鞭子。司炉工人楊菊寬，性子硬，就不服工头的这个压迫，背上經常被工头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。

不久，連十五分钟的吃飯時間也不給了。刁羽翎打着日本鬼子的旗号来吓唬工人，每人每頓就給一个苞米餅子。玻璃厂这么劳累的活，一天干十六、七个小时，这一点苞米餅子能塞哪个肚子角？有一次，厨房潘永盛大师傅买回一担茄子，一些学徒工一涌而上，吃了十多个。刁羽翎一看，

气的心直痛，举起手杖就要打。司炉工人张培兰平时不爱多说话，这时挺身而出，拦住说：“东家，你也不看看咱们饿成什么样子了？连点烂茄子都不让吃，还叫不叫咱们干活呢？”

旁边的工人看见张培兰说话了，有的就顶上去说：“是呀，再不让吃点烂茄子，也太讲不过去了。”

刁羽翎碰上工人大伙齐心一顶，这才把手缩了回去。

好不容易盼到旧历年初一，包一顿饺子。一早起来，大伙刚把饺子下到锅里，一群伪满警察闯了进来，说：“好哇，私自煮白面饺子，你们都是经济犯。”说罢，把饺子一捞拿走了。大年初一，工人什么都没有吃上，饿了一天。

穿的麻袋片

那年头的玻璃工人，被资本家剥削的，不但吃不饱，连裤子都没得穿。老工人王进成十四岁进厂，在这里干了三年，也跟老工人杨林栋一样，连双鞋都没混上。冬天，在垃圾堆里找两只破棉鞋头拖着；夏天，就弄两块木板，找两根麻绳绑在脚背上。有一天王进成到外面去送酒瓶，还是借了条裤子，才走出大门。

那年头，日本人占了哈尔滨，街上到处发生抢劫案件，时不时就听到枪响。他刚走出大门，一个老太太把他喊住了：

“小伙子呀，你没听见街上放枪啦？快别往前走。”

王进成一听，回头对老太太说：“大娘，放心吧，我不

怕。”他不是不怕，他是想：我穷的裤子都没得穿，还怕啥？没得怕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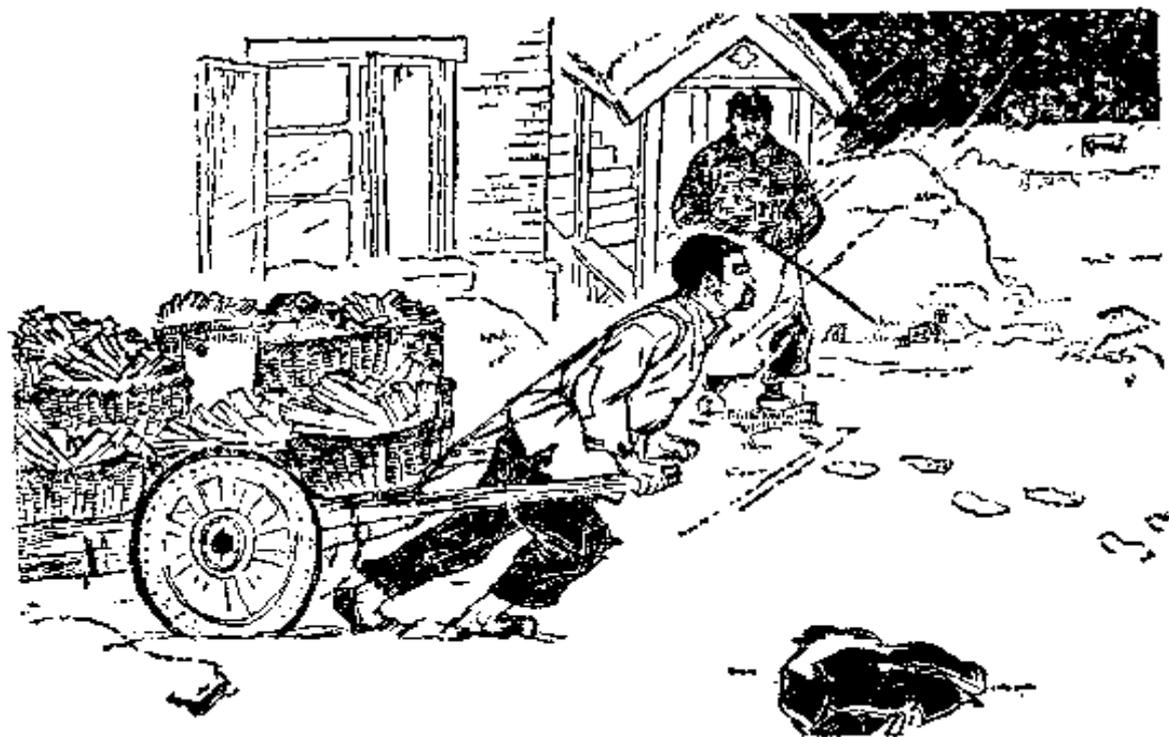
穷的裤子都没得穿，这在当年元吉玻璃厂的工人当中，是常见的事。

那时逢年过节，工人要想上趟大街，得把四、五个人的全部“家当”凑在一起，才能走出大门。有个叫张才明的工人有双鞋，这鞋就成了工人的宝贝。谁要上趟街，就来找他借鞋。老工人孙延兴从家里来时，带来一件棉袄，这棉袄就成了全厂工人的“家产”。有一次，从沈阳来了个穷朋友，天冷了，也没有棉衣穿，孙延兴就把这件棉袄给他穿。这穷朋友后来回沈阳去，天冷，棉袄实在脱不下来，孙延兴就让他穿着走了。没有了棉袄，全厂的工人，那一个冬天连大街都上不了。老工人孙宝利有一床破被子，五个人合着盖。捡一顶破帽子，捂住这只耳朵捂不住那只耳朵。

玻璃工人虽说被资本家剥削的这么苦，可是有骨气。老工人刁家昌不但和资本家刁羽翎同姓一个刁字，而且是没出五服的至亲。刁羽翎该对他“另眼相看”一点吧？不，刁家昌在元吉玻璃厂，被剥削的白天披麻袋，晚上睡暖炉。

有一天下着鹅毛大雪，西北风吹得电线呜呜直叫。刁羽翎看见刁家昌从煤厂里拉杆子回来，脸冻的发紫，他用手里的黑漆手杖，挑起楼梯上的一件脏衣服，朝刁家昌面前一丢，干瘪着嗓子说：“看这么冷的天，就穿那么几件衣服，也不怕冻着。来，快把这件衣服拿去加上。”

刁家昌没在意，那件脏衣服，正落在他的面前。他一脚



工人习家昌一脚踢开资本家给他的一件破衣服踢开，愤愤地说：“我不要。”拉着柁子就走了。

晚上，刁羽翎的一家，睡在暖融融的小楼里，盖着缎子面的丝棉被；刁家昌就夹着一条麻袋片，爬进暖炉里，蜷缩着身子躺下了。

第二天天没亮，司炉工人就在炉里点上了火。等炉里的火烧着了，刁家昌才吃惊的醒过来，捡起麻袋，跳出炉来，差一点没被烧着。

那时玻璃工人冻的钻暖炉，被火烧坏的，有的是。有一年，工人赵锡谦，躺在暖炉里，一只脚被火烧了，在炉里痛的叫了起来，这才冲进去两个人，把他背出来。赵锡谦的脚烂的都发黑了，也没有钱去治，这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子，就这样成了残废。还是解放后，工会才送他到医院去安上了一只假脚。

“份子掌柜”

这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花招真狠毒，软的硬的，见血不见血的，都有一套。他看中了谁的手艺好，能替他多赚钱；或是逢上每年玻璃买卖旺季，资本家互相竞争，狗咬狗的时候，他怕你被人“挖”去，堵了他的生财之道，就摇身一变，笑嘻嘻地拍着你的肩膀，把你请到眼房去，说：“大兄弟，你在元吉不少年了，老人啦！这工厂也算是你的家，给你二厘份子。”

临走，还再三嘱咐：“从今之后，你也是掌柜的呐，干活的事，可就要格外烦心了！你现在在厂里有份子啦，年年要分红利，就比不得是工人了。工钱嘛，就不照手艺人那么支了。”

本来一个好的手艺人，一个月能拿二十多元到三十元，刁羽翎给了他这二厘份子，工钱不但长一个铜子，反而比一般的好手艺人还要少。

这资本家盘剥工人的鬼心眼，真是点滴不漏。工厂那么多原材料，每年年终点货，他都亲自过目，亲手过问。他的贴心会计刁凤山，本来就替他把算盘打的够刻毒的了。利润明明是二万元，他最多只给他写八千。原材料明明有一万元，他也只给他报三千。有个千儿八百的零头账，他根本就不拿到眼面上来。可是刁羽翎还不满足，他把点货的单子拿来一看，又在上边打了个二八扣。扣来扣去，一万

块钱的东西，只剩下二千了。

这年腊月三十，刁羽翎把厂里的份子掌柜的都找了来，一手拿着賬簿，一手拨弄着算盘珠子說：“今年买卖不好，不挣錢，大家这一年的劳累，我都知道，来年赚了錢，再給大家多分些紅利。”

来年正是資本家盖大楼，修大池炉的时候，又没有分紅利。他說：“眼下玻璃行业，人人竞争，不打个底子，这厂就站不住脚啦！往后业务发展了，大家的紅利，还是水涨船高的。”

第三年，一九三一年，照資本家說，是他最“难过”的一年。他“借錢”盖的楼房、修的炉，还没有还清“債”。要大家紧紧褲带，共图发展。

这些当份子掌柜的，明知道是瞎說，也不敢吭一声。这样，一連八年没有分过紅利。最后分了一次，每人就給个十块二十块了事。

真正的份子掌柜有没有呢？有。全厂只有四个：那就是資本家貼心的狗腿子會計刁凤山、工头赵士丰、刁綉堂，和一个管賬的内柜。資本家把“份子掌柜”的分成两种，一种是“紅眼份子”，一种是“水牌子份子”。“紅眼份子”只給他最貼心的狗腿子。“水牌子份子”就作为他拉攏、分化工人的一种剝削手段。什么叫“水牌子份子”呢？就是用得着你了，把你的名字写在黑板上；用不着了，吐口唾沫，就擦掉不算数了。工人摸清了他这一招，任凭資本家讲的天花乱墜，也没有人上他这个当了。

那时，有几个当“份子掌柜”的小职员，一时还看不清这

里面的毒計，上了当，吃了苦，才明白过来。那时汉奸、警察分赃不均，常来元吉玻璃厂找漏子。刁羽翎和他儿子刁家义不露面，就叫份子掌柜的頂去。刁心正、賈树恒、刘載福这些小职员，都去替他蹲过芭篱子。刘載福受的罪最重，抓去之后，坐电椅、灌凉水，最后还是用筐抬着回来的，差一点送了命。刘載福老了，还得替他干活。想回家，連路費都沒有。

豺 虎 同 行

刁羽翎有錢有勢，玻璃工人受的苦，到哪里去說呢？唯一的反抗，就是不干，走。

有一次，厂里的工人，商議要去找刁羽翎涨工資，如果他不答应，大伙就走。

刁羽翎听到这个訊，嘿嘿一笑，对工头赵士丰說：“走？我叫他們走不了。”

元吉玻璃厂工人的工資，虽說名义上一般都是二十几块，可从来沒有当月整数給工人开过。工人要支点錢，每次也就是块儿八角。其余全部捏在刁羽翎手里，用来扩大再生产，加倍剝削工人。現在工人要涨工資，那不比挖他的心还痛阿！他拄着黑漆手杖，走遍了道外道里的兴新、吉江、永兴三家玻璃厂，和这三个厂的資本家秘密协商着镇压工人的对策。

一九三七年秋天的一个晚上，刁羽翎在道外“大世界”里摆下了宴席，为这次密商圓滿庆功。这只喂不飽的老豺



資本家用“大聯合”的詭計，來卡工人的脖子

張，端起一杯血紅的日本葡萄酒，洋洋得意地對桌上的那三個玻璃廠的資本家說：“承蒙不棄，鼎力合作，祝諸位財源茂盛，利達三江。”

第二天賬房先生貼出一張大紅喜報：全市四家玻璃行業，發展業務，實行大聯合。

当师傅的，在名义上还有个“人身自由”，本来想：他不涨工资，腿一甩算跟走人，另找玻璃厂。现在大联合了，全市的玻璃厂，都是“一家”。你想走，也没地方走。资本家的一双血手，就这样卡住了工人的脖子。

一次，一个姓张的老工人有急用，找账房支二十块钱。向会计刁凤山好说歹说，才借给了三块钱。这三块够干啥？老张一气，甩袖不干了。刁羽翎在里屋一听，捧着个白銀水烟袋走了出来，挂着一脸的好笑，不着边际的说：

“怎么啦，大兄弟！你在元吉是老伙计啦，有急用，先支几块去，不够再说……”

这老工人气的刚要张口，刁羽翎连唬带吓地说：“现今全市的玻璃厂都联合啦，你还不明白，你不在我这里干，别的厂子也不能用你。”

师傅都被资本家卡着脖子了，受苦最深的童工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一天孙延兴正蹲在院里吃晚饭，工头抓着他的师兄弟赵连升从外面进来。一进大院，工头就拿着那根特制的大皮鞭子，一边抽，一边问：“你下次还敢不敢跑？说！”

赵连升是松花江北岸呼兰县人，家里就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妈妈。孩子进了厂，受不了这个折磨，想妈想的更心切。这天他趁着放工吃饭的时间，偷着跑到滨江车站，想回家看看。谁知他前脚出门，工头后脚就追来了。这一顿皮鞭子，把赵连升打的全身都紫了。第二天就是端午节，赵连升晚上躺在铺上，哭着对孙延兴说：“哥呵！我活不了呵……”

孙延兴替他擦掉眼泪，安慰他说：“快别那么想啦，叫工

头听着了，又得挨揍。”

端午节，天开始热了。草屋里臭虫闹翻了天。孙延兴干完活，就披条破麻袋片，在屋檐下找个地方躺下睡了。两点来钟起来上工，他跑进草屋一看，赵连升赤身露体地在屋当中上吊死了。孙延兴一看这惨样子，哇一下就哭了起来。屋外的几个工人，闻声赶来，才把赵连升抱着放到床上来。

第二天一早，厂里打炭人上呼兰，把他五十多岁的老妈妈找来收尸。刁羽翎怕这孤苦老人哭闹着要人，把伪满的奉公大队姚队长也找来了。连唬带吓的逼着老人把尸领走了。不到半年，这可怜的孤苦老人，想念冤死的儿子，也活活的气死了。这一家人，就在资本家庆祝“大联合”的发财声中，送了命，绝了根。

这是一笔血账呵！

资本家打着大联合的招牌，把元吉玻璃厂工人涨工资的要求镇压下去以后，没过一年，又分开了。

两年之后，也就是一九四〇年，哈尔滨的玻璃工厂，已不是四家，而是大大小小的十一家了。每到玻璃生产旺季，资本家为了拉工人，象狗打架一样争作一团。这时，刁羽翎又串通了兴新、吉江、永兴这三家较大的玻璃厂，实行第二次大联合。这四个厂的资本家，伙在一起，吃掉了刚刚开办起来的七家小玻璃厂之后，马上就掉转头来，更加残酷地榨取工人的血汗了。

这时，刁羽翎借口“生意清淡”，解雇了大批工人，把留下来的最好的手艺人每月二十元的工资，也打了个二八扣。

这天，刁羽翎把老工人赵福昌找进了账房，一看他穿的是件麻袋片补成的破短褂，皱着眉头假惺惺地说：

“大兄弟，你钱都怎么花的嘛！看！连件褂子也没穿上？”

老赵一听，一股恨气，就要从心里冲出来。他冷冷地问：“东家找我有啥吩咐吗？”

刁羽翎咳了咳干瘪的嗓子，引到了正题：

“这回厂里辞了一大批老师傅。你从小在厂里长大的，照顾你，还留你在厂里帮帮忙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朝老赵身上瞅了一眼，慢悠悠地抽了一口水烟，说：“全哈尔滨十一家玻璃厂，倒了七家。为了大家都有口饭吃，我这才把你们留下来。这局面困难呵！只好把留下来的师傅的工钱打个二八扣。”

老赵想：这不是明着朝我们身上刮吗？我一月才二十一块钱，打个二八扣……

没等老赵开口，刁羽翎就威胁说：“全市就剩这么一家玻璃厂了。有口饭吃，就是难得喽！”

资本家一手遮天，有理到哪里讲，二八扣就二八扣吧！就是打个二八扣，还有十六块八毛钱，可是刁羽翎一拨算盘珠，给他定了十五块。

“东家，照二八扣，我不是该十六块八吗？”

“嗨！你穷糊涂啦？”刁羽翎指着算盘珠子说：“眼下厂子里没活，你现在的工作是端货，要照这个工种，你才只有十二块钱。给你十五块，还是照顾你哩！”

在这手工操作的玻璃厂里，哪能把工种分的那么细？

名义是端貨的，实际干的，还得吹泡、压花。原来在車間干活，都是輪換着，从来也沒有固定一个工种不变的。看，刁羽翎这种剝削手段多么毒辣！

蛇 狼 宴 会

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，刁羽翎父子，在工厂的小楼上，大摆酒宴，宴請两个日本特务。工人背后叫它“蛇狼宴会”。

头一天，刁羽翎拿出剝削工人的血汗錢，遍跑道外道里，选购了最好的酒菜。在他住的那幢小楼上，叫几个小徒弟，里里外外，楼梯栏杆，擦了一遍又擦一遍。

这两个鉄路上的日本特务，一个叫工田，一个叫小林。这天还不到十点钟，刁家父子就毕恭毕敬地站在工厂門口等候。大約十一点来钟，一辆黑色小汽車开来了。刁家父子打躬哈腰，正要伸手去拉开車門，翘着腿坐在車上的日本特务小林，隔着玻璃一揮手：“你的，很好。开路开路。”汽車掀起一陣尘土，开进工厂，停在小楼前了。

刁家父子宴請了日本特务之后，临走又送了一份厚礼。这一年八月，小林就亲手发給刁家义一张証件。刁家义随后就买了两支三八匣短枪，一只六輪子手枪。接着，在工厂大門口，挂上了“关东軍指定工厂”的大招牌。

这招牌一挂，刁羽翎就在“替关东軍干活”的旗号下，胁迫工人延长劳动時間，增加劳动强度，进一步压榨工人的血

汗。

这时他从日本特务手里，承揽了一批軍用药瓶。他一看工人干的慢了点，就叫着說：“现在是給关东軍干活，还不多干点！”刁羽翎还規定一天要完成的数量。完不成，就延长劳动時間。照例每天都干十七、八个小时，有时长达二十个小时。那时，有的工人正在干活，站着就睡着了。

元吉玻璃厂的工人，本来就叫资本家剝削的只剩一把骨头架子了，现在把“关东軍指定工厂”的牌子一挂，和日本帝国主义合起手来，进一步对工人敲骨吸髓，玻璃工人遭受的痛苦，就越发深重了。

刁家义口袋里装了那一张日本特务发的証件，欺压工人的气焰，也更嚣张了。他成天在屁股上，别上那把六輪子手枪，看見誰不順眼，就抬腿一脚，罵道：“他媽的，想造反啦！”工人給他取了个外号，叫“橛杆别子”。

說起这刁家义，就是个道道地地的喝工人血喂大的一条寄生虫。挺着个大肚皮，一条精致的长皮带，松拉拉的拖在肚脐眼底下。塌拉着一对浮肿的眼皮，象成年都沒睡好觉似的。除了吃喝玩乐，別的就什么也不会做。每天从街上回来，左手提着一瓶酒，右手拿着的不是一只老母鸡，就是几斤肉，一路哼着二簧，上了小楼。可別看扁了这个窝囊废，欺压工人可有邪招。看到誰不順眼，他就把你抓到南元炉对面的那幢两截楼上去，一边审問，一边用鞭子抽。这小楼有两間房，里屋是工头宿舍，外屋名义上是工头办公室，暗里却是刁家的公堂。

年青徒工鮑树林，別看人穷岁数小，就是不服资本家、

工头那一套。就为了这“不听话”，在元吉玻璃厂不知挨了多少打。有一次他在厕所里抽烟，被姓王的工头看见了，就拿这抽烟为话头，叫来两个人，把他横按在板凳上，用那根特制的大皮鞭子，狠命的抽了一顿。打的鲍树林动弹不了，这姓王的工头叫那两个人把他架起来溜了一圈，溜完之后，又狠狠的抽了几鞭子，这才放手。有一次是为了干活不听使唤，把鲍树林抓到小楼上，又严刑拷打一次。

那天鲍树林一早两点起来，在元炉上干活，一直干到下午五点，才算把一缸回头料干完。照说，这天干了十四、五个小时，也该歇着了。可是刁羽翎一瞅太阳还老高，他眉头一皱，又指使徒工把吹出来的大罐子，拿去割口、磨平。鲍树林一想：这一干，又得十来点完活。刁羽翎来催了一次，刁家义又来催一次，鲍树林还是坐在地上喝水，动都不动。刁家义一看，生气了，问：“叫你去磨货，听见没有？”

鲍树林眼也没瞧他一下，回答说：“我喝口水，喘口气再去！”

“嘿！你这个臭小鬼，还敢辩嘴？”受压迫的小童工，从来就受他任意支使，不敢说半个“不”字。这鲍树林是什么铁打的，敢顶嘴？

刁家义气的三步两步跨出车间。他刚出门，那姓王的工头一脚踏了进来，抓住鲍树林的衣领子，就往小楼上拉。进屋一看，这刁家义早拿着那根大皮鞭子，气呼呼地站在屋当中，象公鸡斗架似的，拉开架子等在那里了。等鲍树林拖着打伤的双腿，走回宿舍来，大伙替他脱开裤子一看，腿都打现了血。跟着又有个姓杨的年青徒工，也被抓到小楼去

打了一頓。打完人之后，刁家义走进磨貨車間，威胁地对正在被强迫加班干活的徒工說：“誰調皮，就看那姓鮑姓楊的两个人的样子。”

被榨尽血汗之后

在那苦难重重的日子里，哪里有穷玻璃工人的活路？有好多在元吉玻璃厂干了多年的老工人，一身的血汗，被资本家刁羽翎榨干了，一脚踢到大街上，无依无靠，生活无着，严寒的冬天一到，又餓又冻，就倒死在大街上。

老工人許延清一家的悲惨遭遇，就是资本家喝血的罪恶見証。

許延清一家五口，在旧社会就被资本家逼死了四口。他家在山东黄县黄山館，和资本家刁羽翎在一个地方。家里房无一間，地无一分，从小他父亲就来到哈尔滨的玻璃厂干活。許延清四岁那一年，在哈尔滨的山东老乡給他娘捎信說：他爹干活累病了，被资本家赶出工厂，冬天就冻死在馬路上，連尸首也找不着了。那时他哥哥六岁，弟弟才两岁，就扯着娘的衣角，四乡流落要飯。在乡下沒有活路，他弟兄三个，被逼着又走上了他爹的老路，含泪闖关东，进玻璃厂当了童工。許延清十一岁那年，他哥許延名在元吉玻璃厂干活，成天在暗无天日的熔炉前，烟熏火烤，得了肺病，吐血，不能干活了，资本家刁羽翎一看，从这个不滿十七岁的孩子身上，再也喝不到什么血了，就赶着十冬腊月玻

璃生产淡季的时候，把他解雇了。那时許延清的老媽媽在哈尔滨帮人烧飯洗衣裳，自己連个落脚的地方都沒有。他哥被資本家赶出工厂之后，住沒住的，吃沒吃的，不到半个月，就死在馬路上。人死了，連棺材都沒有，就看着他丢在哈尔滨太平桥的圈河边上，被野狗拖着吃了。那时他弟弟許延春才九岁，也在另一家玻璃厂里当童工，这个可怜的孩子，也跟他大哥一样，累的吐血，也被資本家赶了出来，活活地給折磨死了，尸首也丢在圈河边喂了狗。他娘一急，眼看不到两个月，好不容易拉扯大的两个孩子就这么死了，也急病了。病了沒地方住，人还没断气，就被拍在露天院子里。那时已是数九寒天，滴水成冰，許延清娘儿两个，就剩一床破夹被，刚抬到院子里，娘还怕許延清冻着，叫他找个地方暖和暖和。不到下半夜，許延清給他娘送碗开水去，再喊也喊不应了。他娘就这样給活活的冻死了。許延清想起这些血債，痛恨地說：“不是共产党、毛主席救了我，有我十个許延清，在那个吃人的旧社会，也早丢在圈河边上喂了狗。想着这个苦，我一辈子也不能忘。”

那年月在元吉玻璃厂干活的老工人中，有这样惨痛遭遇的，又何止是許延清的一家？

老工人刁見山，是跟資本家刁羽翎住一个村的。論在玻璃厂里拿泡、刻花，哪一样都够得上是个好手艺的玻璃工人。从山东来到元吉，干了二十来年，最后失去了劳动力，刁羽翎一看，再从他身上搜刮不到什么油水了，趁腊月裁人，把他赶出了大門。刁見山孤身一个，家被地主逼得早就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，年老力衰，到哪里去謀生？那年哈尔

滨冷的出奇，八月中秋就下了一场大雪，天寒地冻，穿没穿，盖没盖的，没过去大年三十，就冻死在道外五道街的沟底下。

就在那几年的冬天，被刁羽翎赶出厂的老工人李永年，冻死在道外天益街；在厂里卖苦力的刁二虎，赤身露体，就冻死在工厂大门外的巷子口……

没被资本家赶到大街上冻死的，在厂里也被折磨的没有命了。厂里的一对老徐和小徐，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一个例子。

老徐叫徐培瑞，挑炉工，五十多岁。小徐叫徐培作，十六、七岁，学徒工。那年月，吃也吃不饱，每天连续干十七、八个小时，谁个受得了。徐培瑞本来身体很棒，也眼瞅着瘦下去了。这时正是六月伏天，滚热滚热的炉前，没一点防暑设备，徐培瑞光着膀子，从早到晚，就挺在炉前，烟熏火烤。头天中午，他正拿着长长的大铁杆，朝炉里挑酒瓶，两眼一黑，就昏倒在炉前。在这工厂里干活，夏天热昏倒了人，是常见的事。可第二天一早上工，工头来炉前看了几遍，还没见徐培瑞的影子。他气凶凶地跑进宿舍，走到他床前掀开麻袋一看，徐培瑞已经硬挺挺地躺在铺上，话都不会说了。没过两天，就这样人不知，鬼不觉的糊糊涂涂地死了。

人死了，刁羽翎还故意大惊小怪地问：“怎么？没听说病就死啦！”人死了，还不准从大门抬出去。把板障抽去几块，才从夹缝里把徐师傅抬了出去。

正是那几天，十六、七岁的徐培作也躺在铺上病的说不了话，就剩一口气还在断断续续地喘着。这孩子是一个孤

儿，是山东黄县后徐家屯人，十三岁从关内逃荒来的。他是和苗永敏、苗永敬兄弟两个，同时进元吉来的。这孩子活泼伶俐，手脚勤快，很得老工人的欢喜。可那时老工人也是受人压迫剥削的，瞅着他累的受不了，也救不了他呵！一累病倒了，就再也爬不起来。那时工人住的那个泥草房子，臭虫、跳虱，简直能把人抬起来。苗永敏和其他的工人，看着臭虫把他咬的那么厉害，就在四号炉的火道上，替他铺上点干草，垫上一块破麻袋片，把他抬到这火道上睡。穷哥们也没有钱给他买点什么吃的，就每天完工以后，给他赶去送点水。这孩子就这么折磨了一个多月，活活地给折磨死在四号炉的火道上。他死了，比老工人徐培瑞还惨。徐培瑞还有四块木板，钉了个棺材。黑心肠的资本家，连四块板子都不给他，叫工头弄草席一卷，隔着板障丢到外面，交给拉垃圾的大板车给拖走了。

在那苦难重重的旧社会，黑心肠的资本家，欠下了工人的多少血账！

一 笔 血 账

刁羽翎拿四百块钱办厂的时候，只有两个“小鸡蛋缸”，每个只能化一百五十斤玻璃料。雇佣二十来个工人。

他从这二十来个工人身上剥削了十二年，到一九二〇年，由这两只“小鸡蛋缸”，扩充到四只，工人增加到三十来人。

又經過五年，到一九二五年，由这四只“小鸡蛋缸”发展到六只。每只缸的熔料量也不再是一百五十斤，而是四百五十斤。他还請了个好手艺的修炉师傅，翻修了两盘新元炉。这时，他雇佣了四十来个工人。資本已积累到五万多元。

一只熔料缸，就是資本家的一张血嘴，缸的熔量越大，資本家喝的血就越多。原来在西門臉的那片小厂房，已經滿足不了資本家的胃口，一九三〇年春天，他就花四万多块钱，在道外小水晶街，买了一块地皮，大兴土木，盖厂房、修大楼。还特地用每月二百块钱的高价，請来一个叫布拉斯基的波兰人，替他設計建造了一座能熔七吨玻璃料的大池炉。这是刁羽翎的玻璃厂大发展的一年，这一年他雇佣的工人，达到一百八十多人。一九四二年，又增盖了一个車間，两盘元炉……

就在这一九三〇年前后，資本家刁羽翎用剝削工人所得，在哈尔滨道外三道街，開設了一个元吉公記錢庄。又拿了大約两万块钱，在他老家山东黄县黄山館，买下了六十多亩地，又修盖了一座青砖到頂的庄园。那时这山东黄县的地，每亩寬达七百二十米，比一般的地大三倍。他这六十多亩地，实际就是一百八十多亩。

这一百八十多亩地，就象一百八十多根血淋淋的鉄鏈子，把这黄山館周围一带的几百戶貧苦农民，都穿在刁羽翎的这一双血爪上了。

从此，刁家的这一本血賬，两面都写滿了穷人的刻骨仇恨。他大儿子刁家仁，就凭着这剝削来的血汗錢，在山东当

上了国民党的县长；二儿子刁家义，在元吉玻璃厂坐上了掌柜台；三儿子刁家礼坐守黄山馆，收租放高利贷。

熔 炉 怒 火

受尽了资本家刁羽翎残酷剥削的玻璃工人，心里的怒火，跟这一千多度的熔料炉一样，在日夜地燃烧着。

“破坏生产，不让那老狗日的在我们身上赚钱！”成了当时玻璃工人斗争的手段。

资本家刁羽翎下“回头料”，逼着工人没黑没夜地替他干。从天亮到天黑，还三番五次地跑进车间来监视检查。可是等他一转身，大伙把刚刚吹起来的一个好泡，喇一下朝废料桶里一摔，当废品丢了。有时刚刚吹好的酒瓶，趁资本家和工头不在跟前，接连几个都当“废品”摔到桶里去了。那时谁也不言语，可是几条心都拧在一起。一挤眼，一翘嘴，大伙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了。老工人袁克贵回忆说：有一天上午，整整两个坩埚料的酒瓶子，共有三百多斤，都给他们“报废”了。刁羽翎只好干瞪着眼骂。

有一次郭瑞友和几个工人一起吹酒瓶子，刁羽翎一趟一趟地跑进车间来，再三嘱咐：“大兄弟，这瓶子吹一斤一个呵，可不能多用料咧！”郭瑞友嘴里答话说：“放心吧老东家。这活计干了十多年，没错。”心里却笑着骂：“好一个老剥皮鬼，还想先来个‘将军’呀！”他们一个班上，三个老师傅吹货，都把一斤重的瓶子，吹成了一斤半。刁羽翎来了一

看，紧皱着眉头问：“怎么就出这么点货哩？瓶子都吹厚啦？！”

郭瑞友和另外两个老师傅，也都装着唉声叹气地说：“唉！要赶着出货嘛，料没化好，一挑就是一大团，擰不动啦！下回再注意点。”

下次改吹煤油灯罩。资本家就站在炉前，不断地说：“薄点吹，薄点吹！”可工人心里有谱。不是推说“料没化好”，就是推说“吹薄了怕炸”。明明那小半缸料，可以吹两百个灯罩，可是后来吹了一百个就把料用完了。

刁羽翎不是会用“回头料”来无限制地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吗！郭瑞友和几个老师傅，也想出了办法来整他。

每天一上工，头一缸料，郭瑞友挑的干干净净，真是用



愤怒的工人在研究怎样和资本家斗争

刀子都刮不出剩料来。刁羽翎一看，挺满意。假惺惺地对郭瑞友说：“大兄弟是把能手，看这一缸料多出活，半点没剩。”等他刚一走，第二缸料快用了一半。郭瑞友对烧火的师傅一招手：“预备好啊！”烧火的就连忙抬起两筐料，压进缸里去。

那时大伙就想着：啥时候把你这个黑心肠的资本家整垮了，心里才痛快哩！可是，这个黑暗的世道，什么时候才能变呢？

郭瑞友十二、三岁时，在大连一个工厂里当徒工，上过“平民夜校”。他从识字课本上，就学过“压迫、剥削、自由、民主”这些个字眼。还没念完一年，“平民夜校”就突然被鬼子、汉奸查封了。后来听一些年岁大的工人说，那是共产党办的。就从那时候起，共产党这个名字，就刻印在这受压迫、受剥削的工人心上了。那时元吉玻璃厂的山东人最多，陆陆续续从山东乡下来的老乡，常常带来一句半句这样叫人高兴的消息：共产党、八路军在关内打日本鬼子，抗日根据地的穷人都翻了身啦！

可是，这里什么时候来共产党？什么时候解放呢？

郭瑞友和许多老工人，就象在黑夜望着天上的北斗星一样，怀着希望，想着共产党……

第一次伸直了腰板

一九四六年四月，哈尔滨一解放，刁家义就吓的跑出哈

尔滨，躲到沈阳国民党占领区去了。跑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那年被刁羽翎送去当劳工的王坤等一伙七、八个工人，东北一解放，他们就从劳工集中营里跑了回来，找上元吉玻璃厂来，和刁羽翎算账。

王坤他们当劳工受的罪，现在想起来还叫人伤心。那是一九四三年，警察把他们抓上汽车，就送到太平桥劳工病院集中。在这里鬼子连躺都不让躺，大伙抱着腿，一个挨一个地在地上整整坐了十九天。后来押送到五常县香花山去开水田，到半截河子去修水道。辗转受了两年多的罪，差点没把命送掉。这时回到元吉玻璃厂找刁羽翎，支取出劳工的工钱。王坤领头，气冲冲地找进账房来。

刁羽翎躲在账房里屋一声不吭，让会计刁凤山出来打圆场。

刁凤山走出账房来，就陪着笑脸，一拱手说：“大兄弟，有话好商量……”

“我不找你，叫刁羽翎出来谈。”王坤没等他把话说下去，就直截了当地点了名。

“东家不舒服，有话我们谈，我们谈。”

“不，你作不了主。”

有个姓刘的外柜，一看工人和刁凤山顶了牛，就钻出来想吓唬他们一顿，厉声厉色地说：“你们还讲不讲理？东家不舒服，叫刁先生来和你们谈，这也算对得起？”

王坤一听，火冒三尺，冲上去指着他说：“你算老几？”

刁羽翎一听这架势，在里屋再也藏不住了，就硬着头皮出来说好话，答应给他们补发工资。

在元吉玻璃厂，玻璃工人受了多少罪？那时世道是人家的，誰敢頂他半句？今天这堂堂皇皇的大东家，居然滿口答应給工人补发工錢，这是从前想都想不到的。王坤等人，一路走，一路想：这天下真的翻过来了。

八路军进城不久，刁羽翎就灭火停炉，关门不生产了。他想先看看风声。有些手艺好的老工人，一个也沒辞退，这炉一停就是两个来月。这时张培兰就找着几个老工人商量，去找刁羽翎支工錢。

张培兰走进賬房，把来意一說，刁羽翎說：“啥工錢呵？停炉之前，你們不是都支走了？！”

“大伙說的，是停炉期間的工錢。”张培兰解释說。

“停炉期間的工錢？”刁羽翎还装做不明白似的。接着，故意长叹了一口气說：“大兄弟，你沒見这市面刚解放，买卖清淡，这才迫不得已停了火。大家都是厂里的老人，怕你們离开厂，也找不着活干，这才照顾大家留在厂里。每天供上大家吃飯都困难呵。我不找你們要飯錢就罢咧，哪来的錢还开支哩？”

刁羽翎就是能把天上的月亮騙下来，也騙不过从苦水里滾过来的老工人。

“老东家”，张培兰沉着地說：“現在不是过去那个世道啦。光凭你讲的不行啦！停了炉，是你把我們留下来的。再說，在厂里我們的一双手也是沒闲着呀。”

“不愿留在厂里，那你們就自便嘛！”他撒賴地說。

“不。我們找你要工錢。要走，也得算清賬再走。”

张培兰还特别提高了嗓門，理直气壮地指着刁羽翎說：

“現在八路軍來了，有說理的地方。你不講理，我們找人講理去！”說罷，他朝王大嶺一揮手：“走！”

刁羽翎見他要去，就把他招呼回來，忙着打圓場說：“這樣吧，工資按百分之五十開。暫時沒生產，大伙只是在廠里找點零活干干。”

王大嶺先跨出了賬房門。刁羽翎一把拉住張培蘭，低聲說：“現在解放啦，你賺，老元吉的人啦，就別再跟他們一起干活了。你去散散心，看看電影，遛達遛達，工資還跟他們一樣，開百分之五十。”

張培蘭一聽，心都氣炸了。好善心的資本家，當年年頭歲尾，趕我們出廠去蹲小店，怎麼沒看見你發善心？這會倒想來拉攏我啦！他回去跟大伙一說，大伙都氣得跳了起來，齊聲說：工資少一個子都不行。現今不是他說了算的時候。

那時我們的部隊才進城，政權機關還沒有來得及建立起來。城里只有帶着紅袖章的糾察隊和工作隊。張培蘭、王大嶺一商量，決定聯名到工作隊去控告他。

刁羽翎不知從哪里得到了這個消息，慌忙打發他的外櫃賈魁五來找張培蘭。一見面，就點頭哈腰地說：“大兄弟，我們都是山東老鄉，平常都處的挺不錯，有什麼事不好商量？何必鬧到八路軍那里去呢？”接着，連聲說：“好商量，好商量……”

舊社會垮了，地主、資本家沒有了靠山。從他停爐的那天起，一個銅子不少地全開了工人的工資。在苦水里泡大的玻璃工人。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伸直了腰板，揚眉吐氣。

跟資本家算剝削賬

工人要組織工會了。消息一傳出，刁羽翎就擺出了八碗八碟的“上飯”，請老工人吃飯。他捧着白銀水烟袋，點頭哈腰地笑着說：“大兄弟們辛苦了！現今解放了，人人平等，只要我能辦到的，我一定為大家謀福利。”

過去，能吃上“上飯”的，除了賬房，工頭，只有全廠數得出的一兩個手藝最好的老工人。這回除了學徒工之外，差不多所有的老工人，都被資本家找去吃“上飯”了。大伙紛紛議論道：“怎麼睡了一晚上的覺，老傢伙的心腸變善了？”

哈爾濱解放之後，刁羽翎觀望了一陣，又開始生產了。雖說開了工，他可不拿出大本錢來干。那時廠里三盤元爐，一個池爐，他就開了一盤元爐。工人的生活條件和勞動條件，仍然象過去一樣，一點沒有改變。一九四八年秋天，上級工會派來了幹部，領導工人組織工會，成立勞資協商會，讓資本家老老實實地恢復發展生產，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和勞動條件。刁羽翎一看，急了，想用請吃“上飯”的辦法，把老工人拉過去，讓工會搞不起來。

老工人李發書、張樹理都是被刁羽翎請去吃“上飯”的。刁羽翎還暗地指使他的狗腿子，四處放話說：“參加工會那玩藝，有啥好處？”

上級工會派來的幹部許永海，和廠里的老工人王新發，分頭訪貧問苦，啟發工人的覺悟，揭發資本家的陰謀。那時

厂里还只有一个党员，就是王新发。党还没有公开，这里的工作，属全市玻璃行业联合支部领导。许永海和王新发，找到李发书和张树理，跟他们讲革命道理，讲解放前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。王新发问：“为啥早先资本家不请我们吃‘上饭’，现在却发起善心来哩？”

这一问，被资本家的八碗八碟蒙住心窍的人，也亮堂了。受压迫很深的学徒工，也在车间里嚷开了：“资本家想拉拢师傅，想阻碍咱们入工会呀！那办不到。”

工会在斗争中诞生了，大伙选了王新发当了工会主席。工会成立后，整顿了不合理的劳动组织，在第一次劳资协商会议上，就提出了减少工人过长的劳动时间和实行休礼拜。

刁羽翎一听，一下子屁股就坐不住了，拉下脸，说：“干这玻璃手艺，自古以来就是料好了就干，除了一年三节，没听说过干几天休一天的道理。”

工人代表一听，也动气了。冲着他说道：“过去是旧社会，现在还要叫工人一天替你干十七、八个钟点，办不到了。”

坐在一旁的劳动局的代表，这时也很严肃地跟他讲公私兼顾、劳资两利的政策。他一看，再硬下去，也不行，答应每天劳动十小时，两个星期歇一次大礼拜。

一年之后，才改为每天劳动九小时，歇小礼拜。直到公私合营，才正式实行每天劳动八小时。

劳动时间短了，工人有了休息的时间，可仍然是衣不遮体，没有劳动作业服。等到把这个问题提到劳资协商会上时，工人满以为又要经过一番剧烈的斗争，可没想到刁羽翎右手一举，满口答应替工人做华达呢的工作服。他还假装

关心地说：“咱这玻璃厂是高温作业，次布不耐穿，做华达呢的还能多穿些时候。”他既然同意了，就当着工会办事处代表的面，写进记录，就算达成了协议。

可没料到，第二天一早，刁羽翎就哭丧着脸，跑到工商联去告状，说工人硬逼着他给做华达呢的干部服。工商联打电话到劳动局一了解，知道是资本家在捣鬼，就狠狠地教育了他一顿。叫他以后要好好奉公守法，不要再玩这些花招了。

工会成立以后，极不合理的工资，经过几次面对面地说理斗争，作了一次调整。这次斗争，工人和资本家刁羽翎算了一笔剥削账，剥开了资本家的画皮，使工人明白了是资本家吃工人的，而不是工人吃资本家的这一条极平常而又极深刻的道理。

工会成立以后，不论淡季旺季，资本家是不能随便裁减工人了。有手艺的老工人，一月还是挣个二、三十元；大批的学徒工，一月还是三块五。在劳资协商会上，工人把涨工资的问题提了出来。开头，刁羽翎十分顽固，说什么也不同意，他一口咬着一个死理：“买卖不挣钱，叫我拿啥涨工资？”

“工厂真不挣钱吗？”工人代表问。

“明人还能说假话？”刁羽翎还硬着头皮说：“不信你们找刁凤山看账去！”

刁凤山是工厂的会计，外号“白脸小先生”，谁不知道他是资本家贴心的狗腿子。还找他看账去？

劳资协商会开了两次，两次都没有结果。在最后一次协商会上，工会主席王新发对刁羽翎说：“你说买卖不挣钱，



工会成立后，领导工人跟资本家算剥削账

工人要算一笔账，看看到底赚不赚钱？”

“这账还用算？”刁羽翎还在装蒜：“刁凤山那里不是有账吗？”

“不，”王新发说：“我们算的，不是刁凤山的那本账，而是工人劳动创造价值的一本账。”

那时全厂只有四十来个工人，一盘元炉，六个坩埚生产。每天能生产灯罩一千五百个，酒瓶一千个，苍蝇罐一千五百个。按当时的卖价，一天能收入一千二百三十元（折合现在人民币）。付给工人的工资不到一百元；花费的原材料顶多只有四百元；资本家的利润，就高达七百三十元。那时不是买卖不好，而是生产出来的产品，供不应求。一早起来，门外就排满了队，等着来取货。

“你说，”王新发问：“工人在一千三百多度的高温炉前，

劳动一天，四十多人的工资，还不到一百元。你一个人得的利润，就比四十多个工人的工资高六倍多，这合理吗？这符合劳资两利的政策吗？”

刁羽翎被问得无言可答，这才勉强答应调整工资。师傅的工资，平均增加了百分之四十；学徒工的工资，增加了百分之五十。

工资调整了，刁羽翎的心里可不服气，总是千方百计地使坏主意，为难工人。一会儿说现钱买了原料，工资开不出；一会儿又说货款没收回，连买粮的钱都没有了。拖拖欠欠，今天给一点，明天给一点，压着工人的工资，去做买卖周转。

有一次，刁羽翎手里拿着一大叠钞票，故意在工人面前一亮说：

“不是我不给你们开支，是政府要税，不叫开支，叫我有啥法子？”

工人一听，这话真毒辣，想从中挑拨破坏呢！工会派人去税务局联系。税务局的同志对工会派去的人说：“资本家的税，肯定要按期交。这次的税款，先拿来给工人开支，我们另外限期叫他交税。”

资本家的阴谋没有得逞，工会就拿这件事，作了个很好的反面教材，教育工人提高认识，不让资本家钻空子。资本家只好乖乖地把拖欠工人的工资开了。

古老的玻璃厂，在斗争中新生；在斗争中发展。斗争把全厂的玻璃工人，团结得更紧密；斗争把全厂玻璃工人的阶级觉悟，一步一步地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上来。工人们都

切身感受到：受压迫的劳动人民，没有共产党的领导，就翻不过身来。有共产党的指引，这才睁开眼睛，看清了旧世界，双手打碎脖子上的枷锁，创造幸福的未来……

反 击

本性难改的刁羽翎，在工会成立以后，较量了几个回合，打了败仗，仍不死心，就在生产上，展开了更大的活动。

当时元吉玻璃厂给煤建公司加工灯伞，供农村销售。一听说供农村用，刁羽翎欺瞒剥削农民的坏主意又来了。只要料能撑得动，就催着工人快干。工人说：“这样不行吧？”他说：“嘿，现今农民生活提高了，需要煤油灯的人多啦，供不应求嘛，萝卜快了不洗泥，没关系。”工人见他不听，把意见反映给煤建公司，公司派了驻厂员，坐在厂里检查，这才没让他的坏招使出来。

可是，他并不认输。有一次，烟酒公司订购了几十万个酒瓶，合同上写的每个酒瓶净重九两，他就瞒着工人，私自改为七两半。偷工减料，从中盗窃了一大批原料。还有一次，国家订购了一批白磁吊灯球，其中硼砂是个贵重原料，明明规定硼砂用量是百分之二十，他瞒着工人，减为百分之十。他一而再，再而三的从偷工减料当中，盗窃了大批国家资财之后，这一双罪恶的黑手，更放肆了。

煤建公司加工玻璃灯伞，纯碱是最主要的原料，价钱也

比較貴，他就想在純碱上，鑽一個空子，打國家的主意。他做了一個成本計劃，按市斤計算純碱的數量，却蒙騙煤建公司，按公斤付給他原料錢。工人一算成本，發覺了漏洞，通過工會，把刁羽翎的這只罪惡黑手給當場抓住了。

這時他從本市，從外地，陸續收買進來一大批一大批原料。玻璃碴、硅石粉，堆的象個小山似的。有一天，稅務局來查賬，指着那堆玻璃碴子，問刁羽翎：“你們這堆原料，賬物相符嗎？”

他連忙點頭哈腰地說：“相符，相符。”

轉過身來就罵罵咧咧地說：“見他媽的鬼，干這麼多年買賣，沒見過玻璃碴子還要賬物相符。”

他報了一萬斤。一過秤，足足有十多万斤，而賬面上只寫着幾千斤。

稅務局的幹部質問他：“怎麼漏報這麼多？”

他皮笑肉不笑地說：“這是老庶務估的堆，眼高眼低，免不了有個出入呵！”

當他接到稅務局的罰款通知書時，他去找黨員黃玉林說：“這麼搞，將來夠噲呀！廠子搞垮了，我倒沒得關係，你們哪一個不是拖家帶口的，失了業怎麼辦呢？”

黃玉林早看穿了他的來意，頂了他幾句：“你想想偷稅漏稅應不應該？罰款還不應當嗎？！”

碰了一頭的釘子，他只好乖乖地把偷稅漏稅的罰款，交到稅務局去了。

刁羽翎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中，還想大撈一把，發一筆橫財。那時醫藥公司向元吉玻璃廠訂購一批支援抗

美援朝用的酒精瓶，刁羽翎一拨拉算盘，无暴利可图，推脱說：“我們厂只能做煤油灯、酒瓶，酒精瓶可做不来呵！”

工人听到这个消息，很是气愤，找到工会說：“只要抗美援朝需要，什么我們都能做。”

任务交下了，他还想降低质量要求，不等料化好，就要工人做。医药公司派了驻厂員，一个瓶子一个瓶子的检查，他一看，背后就罵开了：“要这么挨个检查，我把本錢賠了还不够咧！真見他媽的鬼。”

这时，在哈尔滨全市資本主义工商业中展开的“五反”运动，正在暴风驟雨般地進行着。厂里的工会，順着刁羽翎的这一条賬外原料的綫索一查，又发现有两火車皮的玻璃碴子沒有入賬。“五反”“打虎队”就从这里开始，对刁羽翎这只喂不饱的豺狼，展开了反击。

当时有个店員，是刁羽翎的本家侄子。厂里的“打虎队”，从他那里掌握了这两火車皮原料的底細，动員刁羽翎主动坦白交代。可是这个老奸巨猾的刁羽翎，在大会小会上，半个字都不吐。問會計刁凤山，刁凤山也是装着一問摇头，三不知。“打虎队”的工人一看，这哪行？把那个店員找了来，当面揭了底，他这才吞吞吐吐地說：“这都是外柜上給我办的。”

“外柜上办的？”“打虎队”的工人，指着他的鼻子問：“卖出来的錢，装在誰的口袋里？”

斗争会結束了，当晚十来点，刁羽翎偷偷地走下楼来，钻进刁凤山住的宿舍去，他咬着耳朵，对刁凤山說：“厂里的穷手艺棒子，追的很紧，这賬面上的事，只要你不說，我不

說，別人也不知个准数，喊破嗓子，也抓不着把柄。”他哪知道他的活动早就被“打虎队”的工人監視了。他几点几分走出大門，在刁凤山家呆了多久，都被工人一一記下来了。

第二天“打虎队”去找他，叫他交代昨晚上的行动。开始他抵賴，一口咬定沒有这回事。等工人把他昨晚上的活动，說的一清二楚，他才叹了一口气，只好低头承认了。

但是眼在刁凤山手里。斗争一步步深入，就要迫令这个資本家的贴心狗腿子，把偷盗国家資財的眼交出来。

斗争会开了不下十多次，每一次都象挤牙膏似的，挤一点，出一点。一天他都要具三、四次結，口口声声說：“我就知道这一点，再也沒有了。”等到第二天別人揭发了，他又装着如梦初醒地說：“呵！这点我忘啦！”“打虎队”的工人在党的领导下，在職員中进行了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，号召受資本家欺騙利用的職員归队。过去被資本家用“份子掌柜”的封号，蒙蔽了心窍的職員刘子心，刘載福，都醒悟过来，站到了工人的一边，揭露了刁羽翎和刁凤山的罪恶活动。清查的結果，仅是眼外偷稅漏稅的原材料，就有三十多万斤。刁凤山交出来的伪滿时候五块十块一张的大綿羊鈔票，就有三麻袋。这些錢，含有多少工人血泪呵！

玻璃工人們在憤怒地反击了資本家的猖狂进攻之后，人民政府按照坦白从寬的政策，給刁羽翎定了个“严重违法戶”。最后还給他指出了一条改造做人的道路。

太阳照在熔爐上

暴风驟雨的“五反”运动，大大地打掉了資本家五毒的气焰，可刁羽翎心里，还并不完全服貼。暗中抽逃資金，經營不积极，把个玻璃厂，弄的有气无力，半死不活。

“五反”之后，工人的觉悟大大提高，生产劲头更大，千方百計地提高效率，提高质量，要求更快地把生产发展起来。通过斗争，党在工人中吸收了一批党员，建立了支部。这时，有些工人就跑来找党支部，要求再增建一盘新元炉，增加产品，适应市場需要。

支部书记王新发，工会主席黄玉林，先后找刁羽翎开过四次会，每次会上，刁羽翎总是装着愁眉苦脸地说：“咱们建不起一盘新炉！資金沒資金，原料沒原料，再說，生产出来的成品，也卖不出去，哪有本賠呢？”

資本家的“理”，經不住工人一駁。工人向党支部提出：厂里有耐火砖，新炉自己盖；本市有的是玻璃碴子，原料也不用向外地买。工厂是人民的財富，想不发展生产，那是不行。刁羽翎被說的理屈詞穷，最后只好答应修建一座新元炉。

一九五五年元旦，在全国农业、手工业和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的时候，元吉玻璃厂作为全哈尔滨市最大的一个玻璃厂，在工人、店員的积极推动下，脱离了腐朽的資本主义軌道，跨进社会主义的大門，实现了

公私合营。

全厂张灯结彩，敲锣打鼓，庆祝这座古老的玻璃厂重返青春。工人閻凤升一手把挂在大门口的旧招牌摘了下来，朝地下摔了个两半，一脚踩在上面说：“让剥削的旧制度，见閻王爷去吧！”

原先带领工作组，在这个厂里做合营清产核资工作的工作组长宋吉超，就担任了合营后的第一任公方厂长。人民政府为了帮助这个厂的资本家，争取逐步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，安排了刁羽翎为工厂的董事，安排他的儿子刁家义，担任了副厂长。

全厂职工，怀着向社会主义跃进的冲天干劲，合营后的第一天，就把改变落后生产面貌，提到日程上来了。

合营前的生产，很不正常。虽说恢复了两盘炉，生产还是时断时续。生产技术十分落后。产品除了酒瓶子、煤油灯罩、灯座之外，稍微复杂一点的产品，就不会制。

要改变这种情况，大家首先想到的，是让躺在车间里睡了十四年大觉的四号池炉复活。

厂长宋吉超把老司炉工人张培兰找了回来，和他商量，怎样把这个四号炉点起来。这四号池炉是一九三〇年由个波兰人布拉斯基修的。他怕中国工人学去了他的“秘方”，只让中国工人替他打个下手，从不让看炉内的结构。张培兰早先在这炉上摸过，可也不明白炉里的结构。宋吉超问他：现在点火，有没有把握？

凭着工人阶级的思想，凭着工人阶级的手，有什么困难不能解决？老工人满口答应：“能解决。”

宋厂长和老司炉工人一道，摸进炉里，去观察、了解它的构造。

当时这个四号池炉，还是烧木片子。点了火，第一炉料化出来了，不但每天的产量增加了几倍，质量也提高了。生产出来的瓶子，发光透亮，跟过去的产品一比，一个是疙疙瘩瘩，全身沾满了“土麻子”；一个就象水晶似的，洁白无疵。公私合营后的第一个变化，在全厂职工中，展开了一个十分强烈的对比。

市委书记、市长，都亲自来看过，对职工的干劲，表示满意。

接着，工厂扩建了新的车间，修建了新的熔炉。原来只能生产几种产品，现在能生产三百七十多种产品了。

在旧社会被资本家折磨得四处谋生的玻璃工人，如今随着玻璃工业的发展，都陆陆续续回到厂里来了。老工人王进成，从山东来到哈尔滨，刚到元吉玻璃厂，听说这里的工人干六天活，歇一天工，半天信不过。他走进玻璃工人的宿舍，也发楞了：房子宽宽敞敞的，明亮的阳光，照满一屋。一床床的花被子，叠的整整齐齐。他问同伴们：“这是工人的宿舍吗？”

“咋不是呢？现今玻璃厂，不象过去那样啦！”

他一拍手，乐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。

在厂里，他见到了多年没见的老工人张培兰、刁家昌、杨林栋等许许多多的人。一打听，嘿，这些在旧社会眼看要打一辈子光棍的“玻璃棒子”，现今都结了婚，有了孩子。都住上了新房子。

“嗨！”王进成拍着老伙伴的肩膀，高兴地说：“这世道真是变了呀！”

王进成进了玻璃厂之后，一连接到他妈寄来四封信。千嘱咐万嘱咐，叫他赶快回去，不能再进玻璃厂。王进成看着娘的来信，笑了。“嗨！娘还以为今天的玻璃厂，还是过去那个惨样哩！”他文化不高，可是他要亲笔给娘写这封信。把他到玻璃厂来之后，见到看到的玻璃工人的幸福生活，一笔一字地告诉他娘。在信的最后，他高高兴兴地写道：“娘，现今全中国都是共产党、毛主席领导的。咱们家乡好，这玻璃厂里也好。不信你来看吧，那吃人的旧世道，再也回不来了。”

工厂开办了夜校，给每个人发了课本。翻身作主的玻璃工人，今天要亲手来摘掉旧社会压在自己头上的文盲帽子。过去玻璃行业里，哪有女的？现在炉上炉下，女工一天比一天多。女工们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工厂又给这些有孩子的妈妈，办了托儿所。

松花江刚刚解冻，玻璃工人刚脱下棉袄，换上春装，厂里医务室的医生们，就跑到车间来检查玻璃工人的健康情况。准备在一千三百多度高温的熔炉前，安装水帘、电风扇，着手准备起防暑降温工作。还特为高温作业的工人，设立了营养食堂。当许多老工人第一次在为玻璃工人特设的冷饮桶前，喝了一杯带香料的红糖凉开水时，都激动得差一点落下泪来。

一个崭新的生活图景，在玻璃工人面前展开了……

紅花滿爐開

翻身作主的玻璃工人，一下子就把自己的全副精力，放到生產上去了。老工人張培蘭、王大嶺這些有經驗的修爐好手，成天呆在爐上，琢磨研究，怎麼叫爐燒的好，產品質量提的高，產品數量增加的快。

那時的元爐，正在生產安瓿管。這產品是供應醫院注射用的，質量要求嚴，一般人叫它中性管。當時，生產這樣的高級產品，沒有經驗。化一缸料，得一天一夜。頭一天把這一缸料干完了，第二天就得空着手等它一天。等料化好了，第三天才能接着干。等於干一天，停一天。張培蘭一想，這怎麼能行呢？他找到王大嶺等幾個司爐工人商量：“能不能想個法子，把化料的時間縮短？”

大伙連眉頭都沒皺一下，說：我們拼着不睡覺，也要找出法子來。

就在那個時候，他們第一次以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偉大氣魄，用集体的智慧，改造了元爐的封道、火口、火池，提高了爐溫。改完之後，他們當晚下料，第二天一早，一爐紅通通的料液，就化好等着工人來生產了。這一改，化料時間縮短了十二個小時，質量也提高了。

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年代里，他們真是生龍活虎，干劲十足。當時工廠提出來：要增建熔料爐，擴大生產。可是，耐火材料都沒有，怎麼辦？



翻身作主的工人，一下子就把自己的全副精力，
放到生产上去了

工厂党委召开了扩大会议，决定派张培兰带领着一批有经验的修炉工人，到三棵樹去建立耐火材料厂，自己烧耐火砖。

工厂党委负责人对张培兰说：“给你的唯一本钱，就是

人，相信你們会用工人階級的双手，創造出耐火砖来”。

回头，又殷切地关照张培兰說：“老师傅你都熟識，你看誰合适，首先让你挑。”

第二天，张培兰就找了刁家驥、王大岭、潘永兴、李作新、黃玉林、单立順七个人，扛着行李卷，上了三棵树。

那时正是五月初，松花江刚刚开冻，一早一晚，还冻的手脚痛。他們七个人，就在一片荒地上搭起了草棚子，破土开工了。七个人，擰成一股劲，在露天地里打洋灰，砌炉膛。真是头頂星星，脚踏大地，沒黑沒夜地搶着干。苦战了两个月，平地起家，盖起一个耐火材料厂。那时，哈尔滨全市，还没有一个生产耐火砖的耐火材料厂。听说元吉玻璃厂能自己生产耐火砖了，各处都找着来要耐火砖。国家大建設，哪个也不願意拉在后边，还能不全力支持人家？当时只建了一个烧砖炉，这哪里够用？再建一座吧，時間又不赶趟。还是这些老师傅有能耐，他們想了个主意，就地挖个大坑，把坑边砌上耐火砖，上面砌上盖，点上火，不也是一样当烧砖炉使用嗎？一試驗，滿好。烧出来的耐火砖，质量就跟从烧砖炉里烧出来的一样。他們就用这个办法，烧出了大量的耐火砖，支援了其他兄弟厂。这七个老师傅，又用他們亲手烧出来的耐火砖，在这个“耐火材料厂”里，修建了两座能熔料十多吨的大池炉……

建成了耐火材料厂，增建了池炉，好是好，就是天天烧样子，每天用大汽車拉木头，还是接不上烧。一个炉，一天烧的木料，就頂全道外区居民一天烧的样子。各地都在大建設，都需要木材，哪能看着这座炉沒边沒底地烧？

省、市委的同志每次来，都殷切地嘱咐他们说：“木材就是宝，你们一定要想办法，把这批数量很大的木材，从炉嘴里夺下来。”

张培兰想改造这座炉。可是怎么改？没见过，也没听说过。他只是想：外国人能设计，我们有这些烧了十多年火的老司炉，还找不到经验改造它？

他把这个意见提到厂里去，当时个别行政管理人员，也不放心。生产任务那么紧，这池炉负担了一半以上的生产任务，要有个差错，怎么办？问他：“你改煤气炉，提得出书面材料吗？”

他一听，也慌了，我也没上过大学堂。叫我写书面材料，这不是打鸭子上架吗？

王大岭听他一谈，劝他：“老张呀，改造炉，我们可一回没做过呀，弄不好，耽误生产，事就闹大了！”

张培兰说，“我能放下不管吗？不行呵。”王大岭、刁家驥这些老司炉，看他决心那么大，反过来也鼓励他：“那就试试吧！有困难，大伙一起琢磨。”

“那就大胆干吧！”党总支书记鼓舞他说：“出了问题，咱们再想办法解决。”

真的，乍一改，可不那么顺利，煤气不足，炉温上不去，料化不好，三天两头料硬。司炉工人刚改烧煤气炉，操作上不熟练，也掌握不了。这时候，七嘴八舌的也多了。有的说：“外国人搞的能改吗？”有人劝张培兰：“还是改烧杆子吧！”他可不灰心。总支书记成天陪着他，坐在炉前跟老工人一起研究。前后一连十多天，他象着了迷似的，在炉上琢

磨研究，家也不回去，脸也顾不得洗。炉沒有改造好，心比猫抓还要难受。

經過几次研究，王大岭、刁家驥都出了許多好主意。刁家驥十五岁来元吉学徒时，那个波兰人希拉斯基叫他爬进炉去打扫过烟灰，他想：“莫不是煤气道有毛病？”张培兰一琢磨：对，十有八成是那儿的毛病。大伙一研究，加寬了煤气道，降低了深度。再点火試驗，果然煤气上来的又快又足。炉温完全按照預定的要求上升，玻璃料液熔化的很好。不久，全部池炉，都改成了煤气炉，不烧木片子了。当时好多地方的玻璃厂，都来学习他們修建的这座土煤气池炉的經驗哩！

这时，工厂真是成了张培兰的家。早上他到工厂，炉上炉下，到处看看。晚上回家吃了晚飯，他有时还到厂里来，在炉上轉几轉。不論在哪里，他的一顆心，总是挂在炉上。一九五六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一九六一年党提拔他为工人工程师。他說：“是共产党领导我翻了身，叫我睜开眼睛，看清了旧世界穷人受苦的根源。一想到这里，我就觉得我的工作什么时候也做不完。”

还没有走近玻璃厂，远远望去，六七只高高耸立的大烟囱，昼夜不停地欢吐着青蓝色的浓烟。新社会的玻璃工人，在社会主义建設的大道上，奔騰跃进！

